

# 让国宝回家路更顺畅

王云霞

近日，子弹库帛书第二卷《五行令》、第三卷《攻守占》在79年后终于回归祖国。子弹库帛书是目前出土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因1942年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而得名，1946年被非法带离中国。关于非法出境流失的过程，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在他的《子弹库帛书》一书中进行了详细梳理。根据他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该文物流失扎实完整的证据链，国家文物局开启了追索。

这是我国首次通过溯源及流转历史研究，主动追索国际公法无法适用的“历史上流失文物”并成功实现文物回归的实践。我们所说的“历史上流失文物”是指1970年公约生效前因战争劫掠、盗掘、非法转让及走私等不法原因或不道德手段被转移出我国国境的文物。

在文物返还领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4年《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以及国际统一私法协会1995年《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是国际上追索流失文物的主要法律依据。遗憾的是，这些公约并无溯及力，中国作为一个文物原属国，无法据此对公约生效前被掠夺和非法转移的文物进行追索。

近代以来，我国文物流失非常严重。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英法军队和八国联军相继洗劫北京城，仅圆明园被劫掠文

物就达150万件之多。1937年至1945年，日本劫掠我国文物更是超过360万件。与此同时，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瑞典、美国、芬兰等国一些学者、探险家，在我国西北地区通过盗窃、盗掘、骗取等手段，将大量珍贵文物非法转移至欧美各国。中外不法商贩相互勾结，大肆进行走私与非法交易活动，使无以计数的珍贵文物流失。

20世纪中叶以来，越来越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控制，认识到文化遗产对国家历史和增强国民凝聚力的重要性，纷纷提出文物返还诉求。由于西方国家对自己的殖民侵略历史反思不足，现行的法律规则对文物返还存在阻碍，加之许多西方博物馆竭力标榜自己在保护文物、传播异域历史文化方面的所谓贡献和付出，殖民背景文物的返还成为现代国际关系中一个突出的历史遗留问题。

中国不仅加入了文物返还领域的所有国际公约，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文物返还国际政府间委员会积极发挥作用。1997年，中国政府在加入《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时郑重声明：“中国保留收回公约生效前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的权利。”此外，中国与秘鲁、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27个国家签署了关于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物的双边协定，建立了重要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已有59批次2310件（套）流

失海外中国文物艺术品回归祖国。国际社会推动殖民背景文物归还问题的解决近年来有了新进展。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法国将立即返还国家博物馆系统收藏的殖民时期从撒哈拉以南非洲移走的所有文物。德国博物馆协会以及政府主管部门，先后发布了殖民背景文物收藏处置指南，要求德国博物馆和公私收藏机构公开藏品目录，对殖民背景文物开展来源调查，与文物原属国和来源社区开展合作。这些举措得到欧美一些国家的支持。拥有21个博物馆、21个图书馆和众多教育研究机构的美国史密森尼学会，于2022年发布了政策性文件《基于道德返还的价值和原则声明》。该声明提出不仅要依据现行法律要求，还应按照道德标准来调查和处理其收藏品，并将与藏品来源社区、个人以及相关政府和利益相关者密切合作。

我国密切关注流失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相关进展，积极响应并采取行动。2024年6月，《青岛建议书》发布，这是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的具体举措，为破解文物追索返还的世界难题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也是为推动历史上流失文物追索返还争取更大空间。

历史上流失文物追索工作的实践表明，溯源及流转历史研究是我们开展追索工作的必要基础和对外磋商谈判的重要依据。子弹库帛书第二、三卷的回归，正是在充分扎实的溯源研究基础



▲子弹库帛书《攻守占》残片。  
国家文物局供图

上，积极与相关机构展开磋商合作的成果。国家文物局于2023年底就文物的非法流失形成扎实完整的证据链，于2024年4月30日向美国史密森尼学会提交要求返还的备忘录，正式启动对《五行令》《攻守占》的追索工作。在此工作过程中，中方始终将文物返还与以回归文物为纽带推动中美相关博物馆长期合作相结合，最终实现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占》回归祖国。溯源及流转历史研究的质量和成果储备量，直接关系到历史上流失文物追索工作进展。

期待更多中国文化与文物、法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加入到溯源和流转历史研究的队伍中。期待更多流失海外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也期待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取得更广泛的成功。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



▲科考队在克勒青河谷考察。  
骆娟供图

## 对博物馆的爱正在“升级”

杨雪梅

近日，国家文物局发布2024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最新数据。其中，三组数字既展现出博物馆事业的蒸蒸日上，又显示出国民文化消费正在经历结构性升级。一是截至2024年底，备案博物馆达7046家，每20万人拥有一家博物馆；二是博物馆接待观众14.9亿人次，平均每一个人一年去过一次博物馆；三是2024年举办陈列展览4万余个，平均每家博物馆一年举办3个以上的展览。去博物馆看展，已成为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7046家博物馆中，值得注意的是，县域博物馆覆盖率达80%。“小而美”的山东青州博物馆新馆开放两年以来，接待海内外观众400多万人次，这个数字与国内不少省级博物馆不相上下，彰显了观众“为一个展奔赴一座城”的热情。新建的湖北襄阳市博物馆，得益于一系列考古收获，可以展示从旧石器时代到清代不断代、无缺环的通史，成为这座城市人们最爱的文化地标之一。

在14.9亿人次的观众中，青少年的数字占比令人欣喜，达到3.59亿。中国国家博物馆18—30岁

观众占比近50%的数据统计，从一个角度支撑了这一趋势。越来越多的博物馆通过科技赋能、跨界融合等方式，改变叙事方式，让文物“活起来”，吸引年轻观众。他们愿意为自己的所爱“埋单”，各种“出圈”的文创产品便是例证之一。

更多博物馆努力打造“观众友好型”博物馆，分层分类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更多城市致力打造博物馆之城，让观众与城市的连接更加持久。比如，上海博物馆东馆设计了多入口、多路径、多角度的参观方式，强调“文物只是博物馆的一部分，加上观众的体验才构成展览的全部”。在去年尝试“博物馆月活动”的基础上，北京市今年将其升级为“博物馆季”，以国际博物馆日为起点，力求将展览的温度与热度持续到国庆节后，着力打造新型“城市节日”。

博物馆的建设，说到底是我们国家文化建设的缩影。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博物馆正成为既能溯源文明长河，又能回应时代呼声的文化场所。它让观众热爱中国，让世界看见中国。



本版邮箱：ysbs@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王 瑞

探奇增学识

昆仑古道综合科考手记

骆娟

4月23日至5月2日，由新疆喀什地委、行署和深圳市对口支援前方工作指挥部邀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的专家，组成昆仑古道综合科考队，历时9天，行程近3000公里，对喀什区域的昆仑重要地理标志、栈道遗址、古道节点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跨学科考察。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我们自喀什市出发，分两段重走“邓缵先边之路”。邓缵先于民国年间自岭南应试来疆，戍边十八载，两袖清风。他于1920年在叶城县巡边调查，写下《调查八札达拉卡界屯务暨沿途情形日记》。

“西合休”，维吾尔语，意为山峰下的河湾。西合休乡所在的西昆仑山区地质条件复杂，地形起伏大，公路狭窄曲折。经过西合休乡政府后，海拔开始明显升高。越野车在蜿蜒的山路上转弯，仿佛陷入重重的“山路漩涡”，终于，我们进入了西合休乡的巴什却普村和阿亚格却普村。

在昆仑山特殊地质条件的造就下，山沟汇聚处的河谷便成为交通要道。科考队在巴什却普河谷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古代挂壁木栈道，以及河对岸的石垒古戍堡（驿站）、十多处石棺墓葬遗址。专家们判断，此地设有军事设施，说明曾是西昆仑山区的重要交通节点。

这条清代古籍所记载的叶城县通往八札达拉卡的路线，正是邓缵先日记中“羊肠途九折，狼尾路千盘”“霜积鳞崖坼，风狂卵石飞”的巡边之路，那一刻，我们能真切体会到他“探奇增学识，履险见精神”的境界和以文载史的功绩。

随后几天，科考队前往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北坡区域。在此前5年间的科考中，科考队将以克勒青河谷、叶尔羌河诸支流河谷为重要通道的古代交通路线称为“乔戈里古道”，这里素来以险峻的地理条件和严酷的气候条件著称，却是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重要节点，也是亚欧大陆各古代文明的发生、发展、彼此沟通交流的重要孔道。置身这条古老而鲜活的丝路廊道，震撼与触动难以言喻。

以往科考都使用驼队和徒步，现在交通便利，天堑变通途。我们乘车进入克勒青河谷考察古道与地理环境，沿途的多个山口和河谷都曾在古代发挥过交通作用。4月26日，科考队抵达穆斯塔格河与克勒青河交汇的飞来峰下，此处是观赏乔戈里峰的极佳位置。

这里还有一处地标性山峰——海拔4730米的马鞍山，这是一处由冰川磨蚀而成的灰岩山岭。在文献记载中，马鞍山海拔4340米的山口原是古冰川的溢流道，曾频繁地为商队所翻越。此次科考，我们登上马鞍山，重点考察台地上的20多座石围遗址并取样。这些遗址都处在自然环境较好的冲积台上，这说明在乔戈里核心区域和交通道路上，存在古人生活的丰富细节。

可以说，昆仑古道不仅承载着多元一体中华文明交融互鉴、民心相通的历史印记，更见证了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壮阔历程，为我们研究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包容性提供了鲜活样本。



## 走进西安碑林新馆

陈根远



有公元822年杨承和为他的前辈子官梁守谦所立大碑《邠国公梁守谦功德铭并序》。有意思的是，碑第二行“右神策军护军都尉副使、右街功德副使、云麾将军，右监门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弘农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杨承和撰并书”，独独“杨承和”三字被挖去，想是835年杨承和自杀，其名被从碑上抹去。

西安碑林新馆落成，名品光彩夺目，灿若星河。来吧，朋友！西安碑林欢迎你！

（作者为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

上图为西安碑林新馆一角。 陈根远供图

时光荏苒，人们从未忘记中山舰。1997年，长眠于长江底近60年的中山舰被打捞出水，成为中国最大的可移动抗战文物。如今，修复后的中山舰承载着历史的烽烟，被静静安放在武汉市中山舰博物馆。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于1910年由清政府从日本订购。当时，清政府投巨资建立的中国海军，经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其主力损失殆尽。“永丰舰就是为重建海军而生。”武汉市中山舰博物馆馆长刘新阳介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永丰舰于1913年竣工，由中华民国支付尾款接收并编入海军。由于永丰舰曾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等历史事件中立下赫赫战功，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永丰舰改名中山舰。

1938年，武汉会战前夕，中山舰担任从嘉鱼、新堤到金口一带的航道封锁任务。中山舰舰长萨师俊出身于海军世家，牢记“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的家训，积极抗日。由于中日双方实力悬殊，短期之内，中国海军主力舰艇几近摧毁。萨师俊曾悲愤地说：“只有建设强大的海军，才能拒敌于国门之外，才能维护民族的独立和自由。”

1938年10月24日，中山舰在武昌金口附近江面执行任务时，被日机发现。日军6架水上轻型轰炸机飞临中山舰上空，轮番对其发起攻击。炸弹如雨点般从空中落下，中山舰多处被炸起火，整个舰艇被笼罩在滚滚黑烟中。但舰长萨师俊毫不退缩，率领官兵进行顽强抵抗。“当时，中山舰的主副炮已经被拆下并移装到陆上长江要塞，以增加陆上防卫力量，所以中山舰反击能力很弱。在没有空中支援的情况下，中山舰的结局几乎是毫无悬念的。”刘新阳说。

中山舰上，有两处巨大弹坑。一处位于船身，巨大的钢板已深深凹陷并破裂，可以想见汹涌的海水可从此长驱直入；另一处位于指挥台附近，弹坑周围，地板破碎，地板的连接线像一朵巨大的喇叭花从里向外放射。“日军做足了‘功课’，每一次炮击都直击中山舰的关键部位。”刘新阳说。

萨师俊右腿被炸飞、左腿遭巨创，倒在血泊中，他强忍剧痛，靠在瞭望台栏杆上，继续指挥作战。副舰长吕叔允见舰艇将倾覆，急忙令航海官先送萨师俊和伤员离舰。萨师俊却说：“身为舰长，弃舰就是偷生，这是我成仁取义的时候。”他执意不离开，却劝其他人尽快离去。无奈之下，部属们强行将萨师俊抬到小

舢舨上。当敌机发现小舢舨准备载人离舰时，又对小舢舨进行了疯狂轰炸，萨师俊和舢舨上的20余人全部壮烈牺牲。随着轰然巨响，中山舰沉入湖北省武昌县金口镇龙床矶江水底。

武汉会战是抗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战场最广、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历时4个多月，日军“速战速决”的迷梦彻底破灭。中山舰沉没后不久，武汉会战结束。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1986年5月，湖北省文物部门向国家文物局正式提出动议：打捞中山舰。1988年，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1988年5月、1994年3月，海军南海舰队和北海舰队对中山舰进行了两次水下探摸，探明了中山舰的沉没方位等重要信息，在舰尾右侧还发现“中山”两字。1995年和1996年，重庆长江救助打捞公司再对中山舰进行了水下探摸。1996年11月，在孙中山诞辰130周年之际，中山舰打捞工程正式启动。1997年1月28日，中山舰被整体打捞出水。这艘见证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代名舰，终于重见光明。中山舰及其出水文物近6000余件（套），为我国近代海军发展历程、民族工业发展状况、中西方文化交流等多领域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1997年，“中山舰修复保护方案论证会”召开。当时专家议定，应尽量按原有材料、工艺，将舰船恢复到上世纪20年代中山舰的原貌。鉴于舰体外壳板损坏严重，最终各方放弃了在浮船坞上展示中山舰的方案。2001年底，修复工程完工，2008年，中山舰被迁移至为其度身定制的武汉市中山舰博物馆内。2011年，武汉市中山舰博物馆对外开放。

在建筑形似战舰的武汉市中山舰博物馆里，人们可以近距离观察修复后的中山舰，感受其雄伟的舰体和精密的构造，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深入了解中山舰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两处巨大的弹孔创痕依然保留，向后人传递着不屈的民族精神。



山 舰  
武汉市中山舰博物馆中修复后的中山舰  
田豆豆 摄



## 听巴图爷爷讲故事

车承金

“小喇嘛巴图长得很漂亮，小兔一眼就看中了，转身就变成一个美貌呼恨（姑娘）……”巴图爷爷坐在炕中间，绘声绘色地讲着“大小妖精沟”的故事。淡黄色灯光下，我和小朋友或坐或卧，双手托腮，听得如醉如痴。这场景，一晃过去50多年，如今回想，仍历历在目。

记得，那时是冬天，吃过晚饭，放下碗筷，我赶紧往巴图爷爷家跑，唯恐去晚了。巴图爷爷讲《乌龟报恩》《折筷教子》《兔子与狐狸》……听着听着，胖小困了打瞌睡。巴图爷爷说，不早了，回家睡觉，明天再讲。我们不走，央求巴图爷爷再讲一个。巴图爷爷拧不过，又讲一个，我们才恋恋不舍离去。路上，大家埋怨胖小，“害得我们少讲故事”。胖小连忙打保证：“明天一定不困！”

巴图爷爷有讲不完的故事。有天，我问他哪来这么多故事？巴图爷爷捋着胡须笑着说，是小时候他爷爷给他讲的。他还说，屯里会讲故事的人不少。“肚子里面故事比我多的人多着呢！”

我的家乡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位于辽宁省西部，生活在蒙古族自治区喀喇沁部等古老部族。在由牧转农的过程中，蒙古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发生改变，创作出大量具有地域特色的故事情节，包括传说、神话、民歌等，有反映人生观的，也有反映对日月星辰崇拜的，有反映游牧生活的，也有反映农耕生活的。这些内容没有文字记载，以口头讲述、演唱方式一代

讲给一代，一代传给一代。上世纪80年代初，家乡人着手喀左东蒙民间故事抢救挖掘工作，2006年5月入选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08年编纂出版《喀左·东蒙民间故事》12卷，于2009年荣获第九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2018年编纂出版《喀左·东蒙民间故事》24卷，蒙汉对译，收入故事1544篇。超百则的故事家有5人，被誉为“故事大王”。

马建友是令人敬佩的故事家。他童年时因意外事故双目失明，村里长辈们看他可怜，给他讲故事哄他高兴。他把听到的故事全都记在心里，多达167篇。有一年下乡去平房子村，我去他家，见四五个孩子把他围在中间，80多岁的老人仍在给孩子讲故事。

如今，我也成了爷爷辈的人，有好几个孙女外孙，虽有现成故事书，但我从没照书本念过，而是讲给他们听。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像祖辈那样，口述相传，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作者为辽宁省朝阳市退休人员）



说说我家的非遗